荆史钩沉

五部《荆州记》的文史价值

□ 余大中

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，具体涵盖东吴、东晋以及南朝宋、南朝齐、南朝梁、南朝陈，其存在时间为公元222年至589年。这一时期，荆州在南方政权格局中占据着极其重要地位。东吴时期，荆州是群雄逐鹿之所；东晋阶段，荆州乃军事要冲；南北朝时期，齐和帝萧宝融、梁元帝萧绎，西梁中宗宣帝萧詧、世宗明帝萧岿、惠宗靖帝萧琮等皆以荆州为国都。六朝亦是荆州地方志撰写高峰期，先后有东晋范汪，南朝宋盛弘之、庾仲雍、郭仲产，南朝齐刘澄之编撰的五部《荆州记》。以下对这五部著作的文史价值予以简介。

盛弘之《荆州记》

据《隋书》记载，盛弘之曾担任临川王侍郎。清曹元忠依据《宋书》与盛弘之《荆州记》进行比照，认定该书成书时间在宋文帝元嘉十四年（437年）左右。临川王刘义庆是南朝宋开国君主宋武帝刘裕的侄子，长沙景王刘道怜次子，因其叔父临川王刘道规无子，便以刘义庆为嗣。永初元年（420年）刘义庆袭封临川王，元嘉九年（432年）至元嘉十六年（439年），镇守荆州达八个年头。

盛弘之《荆州记》堪称地理学巨著与文史学宏篇，它记载楚国的君主更迭、都城迁徙、疆域伸缩、军事斗争、文化特色、建筑风格等内容。按照当时荆州的辖区范围，依次记述巴东、南郡、江夏、襄阳、南阳、顺阳、宜都、武陵、长沙、衡阳、桂阳、豫章、始安、始兴等郡及郡辖各县境内的名胜古迹、高山大川、洞穴矿泉、民间典故、神话传说、文人事迹，还记录了世界最早的避雷针。全书约284条目，其中地理学内容181条目，文史学内容103条目，其语言峻洁优美，行文骈散相间。

该书约在唐宋期间散佚，但引用者众多，北宋《太平御览》征引最为详尽。目前有不少辑本传世，如王谟《汉唐地理书钞》辑本、善化陈运溶《荆湘地记》辑本。其中，陈运溶辑本较为完备，分为三卷，约24万字。盛弘之《荆州记》对后世影响深远，最为人知的是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中的名篇《三峡》，基本引自盛弘之《荆州记》。正是盛弘之《荆州记》最早使用“三峡”地名，并诞生了“自三峡七百里中，两岸连山，略无阙处。重岩叠嶂，隐天蔽日。自非亭午夜分，不见曦月”以及“巴东三峡巫峡长，猿鸣三声泪沾裳”等千古名句。

范汪《荆州记》

据唐代房玄龄《晋书》记载，范汪（308－372年），字玄平，南阳顺阳人，曾任东阳太守，大兴学校，施惠政，人称“范东阳”。后官至三品的安北将军、徐兖二州刺史。范汪还是著名医学家、文学家，且擅长书法和围棋。著有文集十卷，《全晋文》收录了其《在东阳郡表瑞》等奏疏及作品。

范汪所撰医学著作《范汪方》（又作《范东阳方》《范东阳杂药方》）达170余卷，可惜已散佚。据唐代魏征《隋书》记载，范汪还著有《围棋九品序录》及《棋品》五卷，均为中国古代围棋佳作。

范汪《荆州记》是较早记录荆州相关情况的地理方志类书籍，包含对荆州自然地理要素的描述，如山脉位置、走向，河流流经区域，湖泊大小及周边环境。同时，对荆州境内城市城镇的位置规模，以及古迹遗址等也有相关记录。

虽然原著已散佚，但唐代徐坚《初学记》、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、北宋李昉《太平御览》、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等多有征引。清代王谟《汉唐地理书钞》和陈运溶《荆湘地记》中，均有范汪《荆州记》辑本。

庾仲雍《荆州记》

庾仲雍，字穆之，颍川鄢陵人，出生于官僚世家，是南朝宋时期的学者、颇为多产的地记作家，撰有《荆州记》《湘州记》等地理著作，对今湖北湖南等地域范围的地理研究颇为精辟。

庾仲雍《荆州记》详细记载了荆州的山川、物产、古迹、风俗等方面的内容，原著虽已散佚，但从其他古籍引用的内容来看，该书对荆州的记载较为广泛，如提到秭归“县北一百里，有屈平故宅，方七顷，累石为屋基，今其地名乐平。宅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”。

南朝梁萧统《文选》，唐代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，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，北宋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等，对庾仲雍《荆州记》多有征引。清代陈运溶《荆湘地记》中存有庾仲雍《荆州记》辑本。

郭仲产《荆州记》

据唐代余知古《诸宫旧事》记载，郭仲产为南郡王从事，宅在江陵枇杷寺南。元嘉末起斋屋，以竹为椽。由此可知，郭仲产是元嘉孝建间人。元嘉是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年号，共计29年。南郡王是古代二等王爵，历朝可考者有11人，南朝南郡王刘义宣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第六子，元嘉元年封竟陵王，因辅助孝武帝刘骏夺位有功，改封南郡王。孝建元年刘义宣起兵反叛孝武帝，最终被刘骏所杀。

由此可见，郭仲产是南朝宋时期的学者、地记作家，在元嘉和孝建年间撰写了地理著作《荆州记》。北宋欧阳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郭仲产《荆州记》分为上下两卷，从现存辑本及其他古籍引用情况来看，其内容主要涵盖荆州的地理风貌、城邑古迹、物产风俗，与同时期其他《荆州记》著作类似，是研究南朝宋时期荆州历史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。其原著虽已散佚，但王谟《汉唐地理书钞》和陈运溶《荆湘地记》中均有郭仲产《荆州记》辑本。

刘澄之《荆州记》

刘澄之，徐州彭城县人，为南朝宋宗室大臣刘遵考次子。萧道成篡夺南朝宋建立南朝齐后，大肆诛杀南朝宋宗室，因刘澄之与大臣褚渊交好，褚渊向萧道成再三求情，称刘澄之并不通晓军事，况且与刘氏宗支关系很疏远，萧道成遂同意其请求，南朝宋宗室中只有刘遵考家族得免于一死。

刘澄之在南朝宋末期入仕为官，南朝齐时官至三品的都官尚书，是南朝齐时期的学者、地记作家。其《荆州记》原著已散佚，从现存辑本及古籍引用内容来看，该书对荆州的地理、城邑、古迹等方面均有记录，例如记载华容县东南有云梦泽，一名巴邱湖，是荆地的湖泽；江陵县东三里余有三湖，湖东有水名芡谷，西北有小城叫冶父。清代王谟《汉唐地理书钞》和陈运溶《荆湘地记》中均有刘澄之《荆州记》辑本。

总体而言，六朝时期的这五部《荆州记》各具特色，从不同角度记录了荆州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状况，为研究六朝时期荆州地区的历史、地理、文化等方面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，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史价值。

翰墨荆楚㉚

春山可望。（作者　黄文泉）

荆沙方言口语

1.恶住哒

两个意思：把人震慑住了、压服住了；过分了，超过了承受范围。比如吃恶住哒。

2.哑声

哑，读音a；过分、过度的意思。比如装东西，盛饭，太多，说哑声了。这里的声，与荆沙方言中的极具特色的双声字+声或神，是同样的结构。

3.干争

干湿的干。没有什么道理和内容的争论。指一个人的固执，喜欢抬杠。

4.干诈

干湿的干。没有底牌，没有好牌，忽悠糊弄对方，称干诈。

5.恃横

恃，读音chi，有人误认为是“持”；应该是倚仗、仗着的意思。横，蛮横不讲理。

6.充猴

猴，读hou第一声。沙市话，有时也说“充人”。出风头，自以为了不起高人一头。其实是冒充。

7.打粗

做粗活的意思。说一个人粗活细活都能做，常说他“打得粗”“拿得蛮”。

8.家户人家

平常百姓家。与官家、集体单位相区别。

（黄大荣）

三国故事⑭

斩龙石

斩龙石，位于桃花山东北面10公里处，青竹沟北面的山坡上。

这里原来叫作阿弥陀佛港，说是港，实是山谷。山谷里藤葛满地，树竹参差，飞禽走兽时常出没。在北面山腰的密林杂丛中，掩隐着一方高达数丈的石壁，壁底有一块两丈见方的平地，再往外又是一个深渊，底部有一深不可测的水潭。潭边有一株四个人合抱的白果树傍壁而立，树梢冲向壁顶的青天，还有不少马尾松长在石壁裂缝里。沿裂缝距壁约三尺有人凿了碗口大的一个石坑，一股清泉从里面流出来，行人口渴只要稍弯腰就能喝到清凉的泉水。数九寒冬，这泉水也不结冰，还直冒热气。

相传在三国时期，一个燥热的夜晚，突然间，乌云骤起，狂风大作，尘土飞扬，半空中电闪雷鸣，紧接着惊天动地一声炸雷，一束金光落在阿弥陀佛港的石壁顶上。正在纳凉的人们惊疑不定，不知出了什么事情。打这以后，凡是经过阿弥陀佛港的人都失踪了，就连寻找的人也是有去无回。

有一天，关云长的部下周仓从这里经过，刚走近石壁，看见一条黑龙在树林中对他张开血盆大口，吓得周仓调头就走，得亏他有日行千里之术，才得以从龙口逃脱。从此，阿弥陀佛港石壁处有妖龙吃人的消息便迅速传开了。人们再也不敢从这条路上经过。

这山中吃人的妖龙，原来是南天门绕梁柱的小黑龙，因生邪念，企图调戏玉帝的三女儿，被玉帝贬下凡尘。这畜牲不但不知悔过，反而在人间作恶。

北山脚下，有个叫易震的青年猎手，决心降除妖龙。易震生得五大三粗，臂力过人，能拉得开三百斤力的强弓，百步穿杨，射雁猎狮手段高强，登峰越涧似平地生风。

有天晚上，易震苦想除妖斩龙的办法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朦胧间有一白胡子老头来到身旁，微笑着说：“你一人本领再高，也敌不过妖龙，吾神助你一臂之力。鹿角山中仙人洞有一宝炉，炼出神箭可镇妖龙。即使一箭射它不死，也必有人助你。”易震醒来，原是一梦。因降妖心切，易震还是找到了仙人洞。洞中果然有一宝炉。他按照梦中点化，用了七七四十九天炼好了一支神箭。

易震带上神箭，来到阿弥陀佛港，正在饥饿中的妖龙闻到了人味，精神大振，当易震来到石壁水潭边时，它张开血盆大口向易震扑来。易震不慌不忙，弯弓搭箭对准小黑龙“嗖”的一箭射去，不偏不倚，把妖龙的尾巴牢牢地钉在了石壁上。

妖龙恼羞成怒，狠命直扑易震，但尾巴被牢牢钉在石壁上，不得近身。

这时蜀国五虎上将关云长听了周仓的报告，带了人马赶到这里。只见关云长身跨赤兔马，手执青龙偃月刀，与妖龙展开了厮杀。突然妖龙口中喷出一股毒雾，关云长顿觉双眼昏花，脑涨恶心，四肢渐渐无力，赤兔马也口吐白沫。关云长料定妖龙喷毒，正愁难除妖龙，忽想起华佗给他治伤时留下的一粒药丸，嘱咐他带在身边，日后如遇妖邪自有妙用。

关云长急忙取出药丸，含在口中，顿觉浑身轻松，更加精神抖擞，虚晃一刀回马便走。妖龙误认为关云长中毒欲逃，伸长脖子去吞关云长。谁知关云长用的拖刀计，猛地回身，一刀砍来，妖龙猝不及防，咔嚓一声，龙脑壳掉了下来，骨碌碌地滚到潭里去了，龙身子仍挂在石上，渐渐地化成了一条花岗岩石。

至今，仍有两丈长一圆柱形石头横卧在阿弥陀佛港的石壁之上，当地人将此石头叫“斩龙石”。

文史争鸣

萧绎的荆楚情结及当代回响

□ 袁枫

今夜，倘若你伫立荆州滨江公园，看长江水纹在霓虹下碎成万片金鳞，或许会想起一千五百年前同一片月色里燃起的那一场火。那火光照亮过十四万卷竹帛，也照亮过一个独目帝王的绝望与不甘。作为梁武帝第七子，萧绎以湘东王身份镇守江陵（今荆州）长达二十余年（531–554年），他一生享年47岁，治荆20余年的这段经历深刻体现了楚文化的矛盾性。

荆州为本：萧绎的文化熔炉与政治基业

一是水德之城与少年藩王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言：“江陵故郢都，西通巫巴，东有云梦之饶。”萧绎十八岁初临江陵，在《赴荆州泊三江口》中惊叹“水际含天色”，实则是被一种宏大的文化流体所震撼：江汉合流之处，楚之“云梦泽”想象与南朝“天下水系”图式交汇，少年藩王第一次感到“个人生命史”可以嵌入“大地理叙事”。他于是决意在此筑城、藏书、立命。二是从“湘东王邸”到“江陵学宫”。萧绎的湘东王府，先后延揽庾信、颜之推等二百余人，形成“西府文学集团”。他们并非简单的幕僚，而是“知识共同体”。他们校书——以“玉函山房”为号，抄经史子集约八万卷；他们编志——《荆南地记》《江陵旧事》首开“城市地方志”先河；他们创体——《金楼子》以“子书”之旧瓶装“文章学”之新酒，提出“文以化成”的楚地阐释学。就这样，荆州从军事重镇升成“南方知识中枢”，与建康、洛阳鼎立而三。三是宫体诗的“江汉换气”。萧绎将《子夜》《读曲》的荆楚民歌音节注入宫体诗，形成“蛱蝶为歌”的转韵法。试看其《乌栖曲》末章：“七彩隋珠九华玉，蛱蝶为歌鸾为舞；荆州女儿采莲归，莲舟碎月不成檐。”“隋珠”“九华玉”是宫廷华美意象，“蛱蝶”“莲舟”则是江汉平原的鲜活风物。雅与俗、北与南、宫廷与民间，在他的诗里完成深度融合。

荆州情结：萧绎的定都争议与知识错觉

一是“东”“西”之争。552年侯景之乱平，建康旧臣王褒等连上七表，请“旋轸旧京”；荆州士族宗懔、鲍泉等则以“金陵王气已尽”相抗。表面对峙的是政治利益，深层却是两种“文化记忆”的冲突。建康集团以晋宋以来的“衣冠正朔”自居，代表中原礼乐记忆。荆州集团以楚之“不服周”自傲，代表江汉本土记忆。萧绎最终采纳“西人”之议，表面看是星象谶纬（“荧惑守心”），实则是一种“荆州情结”。荆州二十年，他早已把“江汉水德”内化为“自我镜像”。若离开江陵，便意味着文化身份的解构。二是“玄象”分析。《金楼子·自序》载，萧绎幼年盲一目，常梦“独目乘舟入巨泽，忽睹大鸟衔日而出”。在他的内心世界里，这是一场典型的“创伤升华”：身体缺陷→水域幻想→文化补偿。荆州巨泽，成为其“个体潜意识”与“楚文化无意识”的交叠处。定都江陵，不啻把梦境坐实为帝国蓝图。三是知学矛盾。萧绎一生以学者自居，著作超400卷，虽然前有平定侯景之乱、光复梁祚的高光，却在之后政治军事上接连失败。西魏大军压境时，他未积极备战，反沉迷讲《老子》，错失20天备战时机。拒绝释放囚犯充军、猜忌将领（如王僧辩），导致众叛亲离。萧绎将知识掌控等同于统治能力，却不知当学术脱离现实关怀（“得纤曲而忘大义”），积累愈丰反而愈显荒诞，荒废了治国救亡的实务能力。

焚书悲歌：萧绎的守护悖论与文化断裂

一是十四万卷的“熵增”。554年冬，西魏于谨、杨忠合围江陵。萧绎先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，再自撰《幽逼诗》。以学者之身行毁学之事，以爱书之名施焚书之暴。正如《幽逼诗》中“寂寥千载后，谁畏轩辕台”的自问，千年之下，世人铭记的并非他的才学，而是文明长夜中的那一炬烈火。二是占有式文化的末路。萧绎藏书手段酷烈，曾借口“校对”抄没士族家藏，甚至“夺人图书为己有”。其焚书，便不仅是战败泄愤，更是“知识私有化”的极端呈现——既然不能独占，宁可毁灭。三是“断裂”之后的荆襄。江陵陷落，江陵士族被虏入关者十万；荆襄文化中心西移至襄阳、江州。楚文化由“江汉—洞庭”外向型，退守“荆襄—汉水”内向型，失去“观兵中国”的宏阔。

古今对话：楚文化基因与当代荆州的共振

一是雅俗共生的创新基因。今日荆州“楚辞光影秀”把《离骚》做成3D水幕电影，游客可随屈子乘龙驾凤；“荆楚非遗小镇”里，虎座鸟架鼓化身盲盒手办，一开盒“楚凤振羽”。这是对萧绎“蛱蝶为歌”诗学精神的数字转译——让最古典的，成为最潮流的。二是“筚路蓝缕”的空间重构。楚人“辟在荆山，筚路蓝缕”的原始创业精神，被萧绎演绎为“乱世保境”；而在当代，则转化为“滨江生态新城”的二次创业。在产业上亿纬锂能、菲利华、美的，沿长江布局绿色智造走廊；水系方面护城河西通长湖、东连长江，复现“水德之城”的蓝色骨架；在交通方面荆岳高铁、荆荆高铁打破“江陵情结”，让荆州将成为“宜荆荆恩”都市圈核心。三是文化韧性的警示与启示。“大遗址保护”工程用数字孪生技术复原纪南城、湘东苑，所有数据开源共享，与萧绎“秘不示人”的藏书逻辑形成鲜明反差。开放，成为对封闭历史的最好追思。

萧绎在荆州留下的，既是“冠绝一时”的文学遗产，也是“灰飞烟灭”的历史警示。作为当代荆州人，我们或许应当铭记，真正的楚文化传承，既要保持“凤鸟腾云”的文化自信，也需警惕“独守一隅”的封闭心态。当我们在长江岸边眺望新城天际线时，那个独目焚书的帝王身影，依然在提醒着我们——新时代的发展之路，永远需要在开放与坚守之间找到平衡。